

启蒙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初萌

柳 媛

(中山大学 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及自身所获得的积极的政治成果, 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启蒙的视域观照现代政治文明在近代中国的艰辛起步, 近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就肇始于启蒙, 作为近代启蒙重要阶段的戊戌、辛亥启蒙所内蕴的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正是现代政治文明初萌的最强音。

关键词: 启蒙; 政治文明; 现代民主制度; 现代公民

中图分类号: K25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08)01-0035-04

启蒙是一个历史现象、文化现象, 是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中国近代启蒙大体指的是从 1890 年前后至 20 世纪 20 年代, 著名学者张灏将 1895 年至 1924 年归为中国思想史上由古典而现代的转型时代。此清末民初中西文化激荡的三十年, 亦即中国的启蒙时代^[2]。近代启蒙, 从戊戌算起无不都与民族危机的刺激密切相关, “救亡式启蒙”必定与现实的政治运动难分难解, “可以说是火借风力, 风助火势, 才能形成一场规模宏大, 影响深远的运动。”^[3]虽然胡适曾说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但有学者论证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在发展方向上走向了政治解决之路, 它的实际成效, 也落在政治上。”^[4]戊戌和辛亥时期是近代启蒙的重要阶段, 启蒙与政治运动紧密相连、互相促进, 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发展轨迹与基本诉求, 反映了现代政治文明在近代中国的初萌。

一、政治启蒙是中国近代启蒙的重要阶段

当知识启蒙拉开了近代启蒙的帷幕, 对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思考接踵而来。伴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激烈的政治运动高潮, 以政治运动为依托, 近代启蒙由知识启蒙发展为政治启蒙。

(一) 政治启蒙的肇始

在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那儿, 启蒙与现实

政治运动的讨论是启蒙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 他们争论启蒙是革命的准备还是避免革命的最好方式。在近代中国, 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本身就是启蒙运动, 由于缺乏欧洲“精神个体”生成的商业社会为基础的精神文化背景, 在政治运动中移植的西方人文主义只能是政治式启蒙话语。所以, 近代中国的政治启蒙指的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 追求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运动中, 西方启蒙后逐步确立的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相关的现代民主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其中以民主的国体政体问题为主, 戊戌和辛亥时期的政治启蒙是近代启蒙的重要阶段。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1894 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自强求富的努力化为泡影; 接踵而至的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狂潮, 使得每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更为有效的救国途径。“百日维新”前,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以《国闻报》、《时务报》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 一系列政论文章和《天演论》等著作的翻译出版, 大力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对封建专制统治进行尖锐的抨击, 为变法维新进行舆论上的准备, 同时这些宣传也起到开启“民智”, 解放思想, 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思想启蒙作用; 变法失败后, 从反思戊戌变法失败的角度, 启蒙思想家们注重破除民众的奴隶性, 呼吁塑造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现代国民, 新民思想广泛传播, 戊戌启蒙大

收稿日期: 2007-09-19

作者简介: 柳媛, 女,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博士生。

大向前推进。

戊戌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结束了封建帝制,而且在思想上也是一次划时代的启蒙,这集中表现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使部分中国人萌发现代民主意识,开始意识到自身享有的各项权利,进而积极参与政治,为民主共和而进行奋斗。辛亥时期的政治启蒙较多地体现在思想家们对“国”的新构想,呼吁要将专制集权式的“皇权”转变为民主参政式的“共和”;同时也包括对“民”的新思考,提出要将奴隶式的“臣民”转化成主人式的“国民”。启蒙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因为有了近代化的新国民,才有可能去追求真正的“民主共和”的新国家。辛亥革命前后,启蒙越来越明确地向专制主义政治统治和封建文化勇敢挑战,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有了相当的影响,否则无法解释武昌义旗一举,连最保守的士绅、旧官僚们都能很快云起响应。这一现象恐怕不能只用“见风使舵”来解释,启蒙所实现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显而易见,所以陈独秀认为中国用德先生的意思废了君主。辛亥的民主思想启蒙为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埋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二) 政治启蒙的发展

从知识启蒙到政治启蒙,近代启蒙与后发现代化国家强烈的国富民强诉求息息相关,政治启蒙与政治运动不仅在目标指向上趋于一致,就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启蒙运动与政治活动也有相当的重合,启蒙在很大程度上以政治变革的思想宣传部分的面目出现。但是,启蒙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康德的一位追随者约翰·亚当·贝克曾这样论述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如果一个民族处于道德启蒙的这个水平上,无所畏惧地按照普遍有效的法则来判断对错,那么对人的权利的不断冒犯就会导致革命。这个民族了解它的责任和权利,他知道应该要求什么和可以要求什么。……只要有一丁点儿的冒犯,这个民族就准备发起革命,因为它对正确与错误的敏感已经变得尖锐,而且甚至因为不公正的磨难而被激活。”^[6]可见,他认为启蒙必须领先于每一场革命,启蒙是一切政治革命的根源,只有当启蒙发展到个人和民族能够认识到权利和责任的时候,革命才有可能出现;尤其对于个人,其道德水平只有发展到人性层面的种种不公正已经成为施加于人的负担被具有了自由精神、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个体意识到和感觉到,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在近代中国,政治启蒙显然还没有为革命做出这样的准备,启蒙必然发展到更深刻的、主要指向道德层面的价值启蒙,五四启蒙就是一场旨在为革命“补课”的“后政治启蒙”^[6]。但同时,启蒙也在政治运动中留下丰硕的果实,由于近代中国启蒙的特殊性,启蒙与政治运动紧密相连、互相促进,掀开近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新篇章。

二、政治启蒙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初萌的最强音

政治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及自身所获得的积极的政治成果,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现代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意识、政治文明制度、政治文明行为等方面。现代政治文明以民主政治制度为基础,以现代公民意识作为社会文化心理支撑及内驱力,政治文明既是人们政治观念的更新,更是政治规范的改进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良性运作。因此,近代政治启蒙中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民主制度的向往,对新民的呼唤,对现代国民取代封建臣民的企盼正是中国人对现代政治文明追求的初萌,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合理化与现代化的趋向。

(一) 由封建专制统治的蒙昧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觉悟

对民主的追求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根本趋向,政治文明体现着以民主为核心的实践价值和运行机制,在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是启蒙运动的必然延伸,西方近代启蒙不仅否定宗教神性,确立个人主体意识,而且还有民主国家这一政治制度的建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是启蒙规划的现代文明在政治方面的重要体现。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被打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来自西方的民主主义观念,开始对封建国家和君主制有了清楚的认识和深刻的批判。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7]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大胆批评封建专制、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戊戌时期,维新派们的变法主张已经触及到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本,明确“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8]变官制就是要改革封建专制政体,目标直指确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虽然在政治实践中,改革是不断妥协的,宪法的宗旨被限定在“君民共治”上,争民权始终和维护君权联在一起;但就启蒙而言,戊戌的变法主张是对长期以来绝对不可动摇的“祖宗大法”的改变,无论其实际改革效果如何,政治启蒙使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跳出对传统自觉服膺的窠臼,挑战权威,消解一元和绝对,开始了由封建专制统治的蒙昧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觉悟。

百日维新失败后,虽然维新思想家在政治实践的态度上有不同的变化,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追求仍旧是这一时期启蒙的主旨。严复在二十世纪初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继《天演论》之后,《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说》、《社会通论》、《法意》等陆续出版,大力宣

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认为中国富强的首要条件就是使民众获得自由,享有各项权利,疾呼“吾未见其民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文学、教育、道德、史地和自然科学,著名人物及其学说的广泛介绍评论,在当时颇有影响,他热情宣传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权利,“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自由。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9]主张“誓起民权移旧俗”,以民权兴国权,实现由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观向“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国家观的转变,明确所谓国在于“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为之完全成立之国。”^[10]

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揭露更加尖锐,专制统治被指如同一座大监狱,“监狱之刻,狱吏之惨,犹非笔墨所能形容。即比以九幽十八狱,恐亦有过之无不及”。^{[11] (P379)}同时,革命派依据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法权学说以及进化论的观点在理论上论证封建君主政体的不合理性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中详细论述国民应享有的自由、平等等权利。革命派借用《民约论》的观点宣传自由、民主、平等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12] (P310)}推翻封建专制,“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之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才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换回我生来之自由,以购来人人平等之幸福。”^{[11] (P379)}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推翻清廷,建立“中华共和国”,满怀激情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颁布了完整意义上的共和国宪法《临时约法》,其核心是从根本上将封建时代的“家天下”变为近代意义上的“公天下”,国家不再属于帝王个人,而属于全体人民的努力终于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维新派和革命派在资产阶级政治活动中关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启蒙宣传,是摆脱封建专制文化束缚,追求近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反映,是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演进的体现,政治启蒙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使得以民主政治制度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文明广泛传播,逐步深入人心,启蒙为政治文明在近代中国的推进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本身也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推进的重要体现。

(二)由封建臣民的蒙昧走向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构成民主政治的最基本单位是公民,公民意识的启蒙与发展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是现代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现代政治文明能否真正实现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近代政治启蒙所指向的现代公民意识主要是公民自身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体现为主人意识和权利意识,即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主人身份,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和独立自主的个人

对于应享有的各项权利的认同和感知。

传统专制王朝中的民众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奴隶性的臣民,现代民主国家要求的是遵守法律,享有权利和负有责任的公民,公民是现代国家的主人。戊戌时期,严复率先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思想。戊戌维新失败后,启蒙思想家从反思变法失败的角度开始新一轮的启蒙,从对民主政治制度的鼓吹转向突出个体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注重提高个体的力智德素质。梁启超认为,传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毫无独立自由人格的臣民,这些臣民事实上处于奴隶状态,只知服从,不知自由独立为何物,更不会独立思考和行动。他们服从皇帝,服从古人,服从世俗的成见,不会思考,不会怀疑,几千年专制制度之下,人们对日积月累积淀成一种奴隶性而浑然不觉。自由是个人摆脱奴隶的个体精神生命,是现代国民的基本要素。新民要树立权利思想,敢于认定自己的权利,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国家或政府,必须承认国民的权利,保护国民的权利。他竭力宣扬“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教育家者,以养成权利思想为第一义;为私人者,无论士焉、农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义”。^[13]康有为尖锐地批判尊卑贵贱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抨击使人不得自由的君主专制制度,他将个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宣布为“几何公理”,在康有为看来,“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也”,人“各为一身,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14]被誉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严复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封建统治者“深畏自由”,专讲“怨道”、“矩”,实际上是提倡“去我”,消弭自我意识,使人们成为没有思想的奴隶,以利于他们的专制统治。所以,中西之间的差异就是“自由不自由异耳”,疾呼“民之自由,天之所界”。当然,个体的独立自由并非那一代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终极目标,个体独立自由的价值在于它能带来国家的独立自由,独立自由的国民是救亡图存的有效工具。即便如此,启蒙打开了整体向个体开放的缺口,是对儒家传统“整体至上”观念的猛烈冲击,其意义在于引进自由、独立的西方启蒙观念,强调个体思想的自由、独立,其前提是每个人都有“我物我格”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启蒙追求的理性。近代启蒙思想使中国人第一次有了独立自由的个体的人的观念,为现代公民意识的萌发奠定坚实的基础。

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加激烈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家属于拥有自由、平等、独立权利的新国民。思想家们从议会、立宪、共和这些上层的东西转而更加关注民主的真正载体—民众,邹容等革命党人开始提出“国民”的新概念,呼吁大力培养新国民,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成为舆论宣传的中心。“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

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强调“无权利者,非国民也”、“无自由之精神者,非国民也”、“不平等等者,非国民也”^{[12](P310)};邹容明确指出:“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11](P375)}可见,国民应该拥有人身自由权和参政权;国民应担负起一个公民对国家应负的职责;国民拥有保证自己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和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自由;公民有平等权,人人有合法的生存权和自由竞争权。无论是在官民之间、男女之间、还是夫妻、父母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这样,“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得其平,举国之人无一人不得其所。”所以“不平等等者,非国民也。”新的国民是自立的而非盲从的,自主的而非随意的。“不独立者,非国民也。”邹容等人心目中的国民,并非一般的民众,更不是中国古代的“臣民”或“奴隶”;而是有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参政能力、道德修养、知识水准的现代公民,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将公民权利写在根本大法上。当然,近代中国,新国民的培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它

参考文献:

[1] 康德,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
[2] 高立克.五四的思想世界[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9.
[3] 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J].炎黄春秋,2003,(3).
[4] 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J].近代史研究,1996,(4).
[5] 约翰·亚当·贝克.启蒙导致革命吗?A].启蒙运动与现代性[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 薇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7] 郑观应.议院[A].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141.
[8]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A].变法通议[C].北京:华夏

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交织运作的结果,尤其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当时来看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辛亥时期关于新国民思考的意义主要还是体现在思想启蒙上,由封建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这是中国政治启蒙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和核心所在。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政治启蒙是反对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中介点和精神支柱,政治启蒙所追求的民众对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觉悟和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正是启蒙规划的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如果说,近代启蒙始终遵循这样的逻辑,通过对封建专制制度及思想文化的不断冲击、改造,铸造以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等具有近代思想观念的新国民,从而建立一个富强民主的中国;那么,启蒙与政治文明之路就通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出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文化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摆脱奴隶性的臣民束缚,成为积极参与政治的、享有各项权利的,自由、平等、独立的现代公民。在近代中国,启蒙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连,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时常合流,启蒙既启个性之蒙,也寻求国家的独立富强,启蒙既是思想变革的需要,也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需要,启蒙既具有文化意义,也具有社会意义。

出版社,2002.5.
[9] 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9.41.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9.
[11] 邹容.革命军[A].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375.
[12] 佚名.说国民[A].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310.
[13] 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A].饮冰室合集之四[C].北京:中华书局,1989.39.
[14] 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72.

[责任编辑:蒋民胜]

(上接第31页)故多因果之谈。(《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陈汝衡又从别一角度论述到这一点,他说:“从文学史去看,六朝以来大量志怪小说的产生,也就是民间讲故事的人特别多的旁证。当时说书能手活跃在民间,经过文人的记载,就丰富了这时期的志怪文学,这点是不可忽视的。”李剑国说:“古小说的创作不同于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要经历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学术论著[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9.
[2] 王国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M].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43.
[3] 胡适.白话文学史[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60.
[4] (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Z].中华书局,1992.
[5] 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M].上海三联书店,2002.

两个过程。前一个过程是口头形式的故事,后一个过程是文字形式的小说。”^[11]佛经故事和志怪小说共同具有口语文学和口头传播的特点,这更增加了两者交融的亲和力。

综上所述,“鬼神志怪之书”嬗变及“释氏辅教之书”兴起均由东晋以来僧侣讲唱直接促成,佛教民众化对中古民间文学的影响不可不谓大矣。

[6] 贤愚经记[A].出三藏记集(卷九)[C].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2.
[8] 李亦园.李亦园自选集[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35;336.
[9] 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75.
[10] 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1]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15.

[责任编辑:阳玉平]